

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 机制转换研究

来佳飞 杨祖增 冯洁

内容提要 近年来,长期支撑浙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而以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模式尚不能完全替代旧动力衰退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浙江经济需要以塑造新需求、推动要素升级和优化配里、打造更为均衡结构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来重构需求动力、要素动力、结构动力和制度动力,从而加快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增长中高速、质 I 中高端”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动力机制 供给体系 要素动力 结构动力 制度动力

作者杨祖增,《浙江经济》副总编辑、高级经济师;来佳飞、冯洁,《浙江经济》编辑、经济师。(杭州 引 0006)

浙江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近年来,长期支撑浙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而以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模式尚未完全建立。面对浙江经济增长减速换挡、放缓下行态势,见需探寻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规律,加快培育浙江经济增长新动力,完成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已是新常态背景下浙江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命题。本文从需求变动、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制度供给等四个视角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分析了改革开放尤其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特征、机制变动及其演变趋势,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重构和机制转换的具体路径与政策选择。

一、浙江经济增长的基本形态和动力演进

(一) 经济增长的基本形态

过去的 30 多年,浙江走过了一段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2015 年全省 GDP 年均增速达 12.65%。2015 年浙江 GDP 为 42886 亿元,人均 GDP 超过 12000 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4.3:45.9:49.8。按照西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判断,浙江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即将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

在这一历程中,浙江经济经历了几次完整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周期,而每一次繁荣期所依靠的增长动力也有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抓住改革动力,全面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家庭工业、乡镇工业和专业市场开始兴起,并由此拉开了浙江现代意义上经济增长的序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浙江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方针,出口导向型经济快速崛起,“小企业、大市场”的运行模式成型,浙江也正式跻身全国经济大省之列。但 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市场风险加剧,出口贸易大幅下挫,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工业、出口、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增多,高消耗、高污染、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浙江率先遭遇“成长的烦恼”。进入“十二五”时期,浙江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 8.2%。浙江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主动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主动把重点聚焦到提质增效上”,对经济增长的认知从“唯 GDP 论”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虽然 2015 年浙江经济走稳向好、逆势上行,但经济增速换挡的现状并没有改变,目前仍徘徊于本次经济周期的底部阶段。在经济周期的谷底阶段,原有经济动力开始疲软,尽管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在加速积聚，但新动力尚不能完全替代旧动力衰退所造成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进入稳态。在这一阶段研究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和机制转换尤为重要，如果浙江不能尽快构筑新的增长动力，就有可能在工业化后期止步不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不能顺利地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

（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演进

一个经济体（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动力因素，即需求拉动系统和供给推动系统：从需求拉动系统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从供给推动系统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推动、结构供给推动和制度供给推动。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知识等，以及要素之间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乃至生态结构等；制度供给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制度或体制的演进和优化，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当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扩张需求、拓展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增加或改善供给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也要随之更换。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而需求侧因素以及要素、结构和制度等供给侧因素是构成了影响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和新机制培育的四大关键因素。历史地看，从这四个维度展开，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动和机制转换已完成或正在经历如下演进历程：

1. 基于需求变动的增长动力转换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作为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所发挥的作用又各有千秋，形成了不同的需求动力结构。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运行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满足居民生活中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消费对增长发挥了巨大的引导作用。第二阶段，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为给轻工业发展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浙江走一条“以进养出”的新路子，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大规模的出口效益，出口对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第三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后浙江经济开始更多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地方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房地产、基础设施等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投资、出口增速出现回落，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体稳定，消费贡献趋于上升，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省内、省外）的带动。

2. 基于要素供给的增长动力转换

在浙江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要素的扩张性投入。要素供给的增长动力突出表现在大规模数量的投入。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当下，人口、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等资源要素约束强化、成本上升，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在减弱，经济增长由要素“量的依赖”转向要素“质的提升”，从传统要素供给向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新的要素供给转变，突出表现在要素质量提升、优化配置和创新驱动，即从土地盲目扩张向注重土地利用效率转变，从依赖大量低成本劳动力投入的劳动力红利向注重劳动力结构和质量的人才红利转变，从低端产品的加工制造、简单的投入产出活动向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主导的产业活动转变。

3. 基于结构供给的增长动力转换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动力供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二三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调整和演进，历经“二产”高潮的结束与“三产”高潮的迭起。1979年浙江三次产业结构为42.8:40.6:16.6，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随后工业比重快速上升，1987年首次形成了“二三一”结构，1998年工业比重达到历史峰值，三次产业结构为12.1:54.8:33.2；到了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4:47.7:47.9，“三二一”产业结构将成为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趋势。二是城乡结构的调整。城乡结构包括城乡人口结构、城乡生产结构，归根结底表现在城乡收入结构上。浙江城乡收入差距有过一段缩小与扩大循环的过程，但伴随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力、城乡结构调整的“正外部效应”的持续显现，从2006年至今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三是区域结构的变化。县域经济路径依赖开始破除，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向城市经济、都市圈经济转型，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已集聚了最多的高端要素和高端产业。同时，随着“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政策落实，原 26 个欠发达县实现集体“摘帽”，区域间经济发展更为均衡。

4. 基于制度供给的增长动力转换

改革开放 30 多年浙江经济实现超常规发展，制度创新是重要源泉，突出表现在市场先发、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浙江，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 60% 以上的税收、70% 以上的生产总值、80% 以上的出口、90% 以上的就业岗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现代化发展序幕、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从农村到城市”、十五大提出“多种经济形式实现公有制经济”……每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都是在重大制度变革后诞生的。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吻合，改革往往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面对经济新常态，制度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本轮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浙江率先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政府改革、“一体化”行政审批改革、要素配置机制创新及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改革，使改革红利成为增长新常态下的重要动力。

综上，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跃升和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不断改变，浙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变动、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动力也在不断发生转换。而不断满足日益增进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导向，要素升级、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创新驱动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动力，制度变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实的保障。浙江经济目前所处的阶段不再是高速增长，也不是由高速增长掩盖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后盲目慌乱的阶段，而是正视新旧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并致力于动力升级的关键时期。

二、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的转换路径

浙江经济先于全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也先于全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当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系统性风险、看空预期明显升高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滞涨的时候，浙江经济率先走稳向好无疑是最好的还击，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通过改革创新，中国有能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有能力防止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经历过 GDP 增速放缓的焦虑后，凭借内生的市场敏感和改革创新的先行探索，浙江经济下一步的走向和路径已经明确——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调整优化和改革创新力度，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和机制，充分释放有效需求新潜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完成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使浙江经济平稳转入新的可持续的增长平台，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的发展。

（一）塑造以新消费、新型投资和优质出口为重点的新需求，重构需求动力

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三大需求的形态和作用方式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在发生显著变化，而且新常态宣告了过去依靠大规模刺激需求来拉动增长的模式已经终结。需求动力的重构在于塑造新需求，发挥新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新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优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效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

从消费动力看，浙江已进入高额消费阶段，居民消费进入结构快速升级期，消费观念向注重消费、提前消费转变，消费偏好从温饱型向享受型、高品质和服务型消费转变。尽管传统消费热点仍然是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消费新需求正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源泉，正加速向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新型消费转变。须应对新的消费趋势，创新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尽快解决“高端消费不足和低端消费过剩”的矛盾现象，同时加快完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使新型消费成为推动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

从投资动力看，浙江已从规模投资向效率投资转变。近十年浙江投资报酬递减效应逐步显现，投资的规模增长效应越来越弱。房地产市场进入去库存周期、传统制造业亟需加快去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面临融资困境，粗放的投资需求明显减弱，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在于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新型投资规模，将投资重点转向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如省域城际高速铁路建设、都

市区内部轨道交通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建设、生态环保以及公共服务提升，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成为提升效率、创新驱动的载体。

从出口看，“大进大出”已成为过去，“优进优出”已是关键。浙江传统出口主要是低端加工制品，对产业转型升级并无裨益，“出口多少不重要，出口什么才重要”，重点在于加快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技术、高端服务的出口，全面构筑以渠道、品牌、技术、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不断提升浙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

（二）以创新为核心，推动要素升级和优化配置，重构要素动力

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要素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要素动力的重构在于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将主动权交给市场，尽快建立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技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要素驱动全面转向创新驱动。

从创新动力看，随着资源禀赋与要素成本的变化，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的依赖性日益增大，研发积累与持续创新投入变得日益重要。浙江须进一步突出创新技术的供给，全面提升全省创新能力。要放眼全球创新大格局，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创新由跟踪、并行向领跑转变，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要着力推进产品创新，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双创”的指导下，发挥浙商的作用，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要推动高水平创新平台的构建，依托重点科技城、高新园区、特色小镇等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创新示范中心。“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技术的创新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技术的更新迭代、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的提质增效取决于最终所能实现的生产力，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含着完整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完整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落地。

从劳动力动力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量减少、工资成本提高，对劳动力要素的关注须从数量规模转向结构升级。要推动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创造“新人口红利”。高质量普及十五年基础教育，加大重点高校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力度，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突出“高精尖缺”导向，面向全球加快高端人才的引进，集聚高端人才。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过程、德国的工业4.0，都有优秀的技术工人支撑。浙江当下需要加快职业教育的重新布局，为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实现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转型匹配。

（三）打造更为均衡的产业、区域、城乡结构，重构结构动力

“均衡”是结构优化、动力重构的核心，打造更为合理均衡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不仅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看，服务业、新经济新业态已成为新兴支撑力量，服务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要牢牢把握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大趋势，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引擎；要牢牢把握传统经济和业态向新经济新业态转变的大趋势，推动信息经济、“互联网+”等的大发展，建设特色明显、全国领先的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创新、智慧物流、数字内容产业中心，确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率先形成发展新优势。而浙江产业结构升级的下一个风口将是信息化与工业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万亿产业，促进产业集群化、高端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全面提升先进制造业竞争力，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加快“浙江制造”向“浙江智造”转型。

从区域均衡发展看，区域融合和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必须从增强发展整体性出发，切实把握好优势与劣势、领跑与赶超的关系，转变非均衡发展的模式，构建区域均衡发展的新体制。要加快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海洋经济区、四大都市区、生态功能区为基本架构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相对落后的生态功能区要因因地制宜地突出区域特点，全面走上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的路子，在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努力追赶，实现区域更加均衡发展。

从城乡结构优化看，要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城乡相向而行、融合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

带动资源要素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创业创新机会的大幅度增加，从而带动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要牢牢把握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大趋势，全力推进都市区建设和城市经济繁荣，推进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全面推进城乡建设转型，加大农村改造力度，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实现城乡区域发展更为均衡。

（四）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创新制度供给，重构制度动力

增长、制度和改革高度融合，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放松“看得见的手”的管制、市场化体系的构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完善等体制机制创新措施将构成制度新动力。

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制度供给，继续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探路者作用。继续推动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把推进政府改革作为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杠杆，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依法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治理转型。要突出重点，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新型城市化撬动、国家战略举措带动的相关制度供给，在户籍、财税、社保、生态、医疗卫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加快放开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民营门槛，促进其市场化竞争体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大幅度削减企业投资“负面清单”，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和参与国企改革。加快金融改革，推进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互联网金融、民营银行、基金小镇等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充分运用推广PPP、特许经营等融资模式，激发浙江民间资本新活力。

进一步扩大开放。依托“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国家开放政策，不断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培育本土跨国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加快浙江企业的全球布局。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建设一批中外合作、合资的产业园。

站在历史的节点，浙江经济的增长动力结构重塑不仅要关注“需求端”的“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供给端”的“三大发动机”，要素动力、结构动力和制度动力的重构，对应的是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深化改革，而这三者中位居首位的应是制度动力的重构，制度变革的先发可以进一步激发创新驱动、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在浙江发展的关键期，新需求、新要素、新结构、新制度等新动力群将打破过去增长的路径依赖和转型困局，构建新的增长动力机制。